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刘玉兰^{1,2}

(1.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常州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 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 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 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驱除其流动性, 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 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精神健康; 流动的劳动力体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1) 05-0099-07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and Influence Factors

LIU Yu-lan^{1,2}

(1. School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Law and Ar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the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and its impact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y have poor mental health. There are different points from previous studies, only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factory regime has significant effect, the social suppor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The reason is that the state, local government, capital constructs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which results in their poor mental health.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o promote migrant workers' citizenship and get rid of their fluidity, is effective to enhance their mental health.

Key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一、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深化, 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

收稿日期: 2011-04-21; 修订日期: 2011-07-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33)。

作者简介: 刘玉兰(1982-), 女, 四川泸州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常州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社会工作。

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人数总额大约为2亿人,其中16~30岁的人数占农民工总人数的61%^[1]。流动给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农民工精神健康方面的报道却越来越多,特别是2010年富士康工人的连续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和政府对于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

现有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值得注意。潘毅关于深圳外来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的研究,是我国农民工精神痛苦躯体化表现的较早的有影响力的描述^[2]。何雪松等通过对上海城乡迁移群体的研究,发现25%的男性和6%的女性精神健康状况不好^[3]。刘东、李露(Lu Li)等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4-5]。影响因素方面,学者认为主要与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水平等个人人口特质与打工时间、生活事件和社会网络等社会特质有关^[6]。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仅有刘传江、徐道稳等少数学者从心理压力、需求满足角度做了一定的尝试。

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已日渐凸显,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研究却较少,我们难以全面认识这一群体。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研究需要在两个方面加强。

(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内涵方面。考察现有的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研究,对精神健康和农民工两个关键概念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一方面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广和相互比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现象。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研究,则主要从其心理压力出发,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直接相关的研究较少,所以理清其精神健康的内涵和表现至关重要。

(2)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方面。考察现有的探讨农民工精神健康影响因素的一些研究,有探讨社会支持的,有探讨个人特质的,但是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这使得现有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解释力不够。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迁移压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有学者认为迁移伴随着生理、社会和文化的三种转变,其中生理转变,包括气候、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变,包括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地位、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转变,包括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的转变。这些转变会对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人是否能够适应这些变化,与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有紧密的联系。国内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认为迁移压力对移民精神健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移民压力越大,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关于移民的迁移压力,不同学者的考察范围有所不同。何雪松等认为移民压力包括:经济与就业压力、文化差异、缺乏社交生活和人际冲突四个方面^[7]。刘东认为移民面临的是生活压力、生活方式压力、情感压力、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五个方面^[8]。黄富强(Wong, F. K. D.)等认为移民面临四个方面的压力:生存议题、失落、文化差异和期望^[9]。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迁移和工作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压力主要表现在迁移感受、工厂体验、经济和就业压力三个方面。

(1) 迁移感受与精神健康。迁移感受主要是指个体迁移后在城市中对于公平与否、排斥与否、日常生活环境和城市整体适应情况的主观判断,其与移民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比如:移民所体验到的歧视或者社会污名,均会给移民造成很大的压力,从而造成一些消极的心理状态,导致情绪低落、紧张和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失调。标签理论就直接展示了污名和消极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感受与其精神健康有关,由此形成假设1.1。

假设1.1: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迁移感受有关,也就是说迁移感受越积极,其精神健康状

况越好。

(2) 工厂体验与精神健康。工厂体验是指个体关于工厂劳动权益保护和工厂管理体制的主观感受。工作场所的权益保护情况会影响个体的精神健康,比如:工作场所暴力、虐待和强迫与精神健康之间有紧密关系,工作场所暴力往往会导致个体抑郁、自杀等意念的产生^[10]。郑广怀补充说明了其他的微观劳动权益,如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等与精神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工厂体制也会影响员工的精神健康^[11]。现实情况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状况普遍受到侵害,月平均收入不到900元,劳动保障水平极低^[12],且面临的长时间工作、强制性加班等非人性化的工厂管理体制。由此形成假设1.2。

假设1.2: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工厂体验有关,也就是说迁移体验越积极,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3) 经济和就业压力与精神健康。经济和就业压力是指个体由于经济和就业状况而感受到的压力。有研究指出,就业能够提供给个人:时间结构、社会联系、参加集体行动、地位和认同、规律的行为,而当一个人失业,那么这五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其精神健康^[13]。失业所造成的生活变化与精神健康有紧密联系,下岗职工中大约有61.32%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14]。失业本身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失业使人们缺少了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对生活情形的控制感,这最终影响其精神健康^[15]。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外出的动机主要是个人发展和经济取向的,所以经济和就业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至关重要。由此形成假设1.3。

假设1.3: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经济和就业压力有关,也就是说经济和就业压力越小,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2. 社会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社会支持主要是指亲属和新建网络关系的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20世纪70年代,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对健康的作用,便开始了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者认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无论对身体健康还是精神健康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诸如提供食品、住房、工作、信息和精神慰藉等^[16]。有学者强调了社会支持可以使得个人产生主观归属感、被接受感和被需要感,从而有利于个人建立健康的感觉和释放紧张症状^[17]。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无论是就业信息的传递,结伴寻找工作,还是职业流动,其关系网络的支持作用突出。由此形成假设2.1。

假设2.1: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与其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关,也就是说社会支持越多,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三、研究设计

1. 精神健康概念操作化和指标体系

本文共有三个主要概念:精神健康、迁移压力和社会支持。如表1所示,三个概念是一级变量,它们形成了8个二级变量。本文中的变量关系是:表示精神健康的价值因子、生理和心理因子、精神健康总变量是因变量;表示迁移压力的迁移感受、工厂体验、经济和就业压力是自变项;表示社会支持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是自变项;基本人口特征变量: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性别、工种是控制变量。

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项研究的资料来源于中山大学蔡禾教授主持的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调查数据(05&ZD034)所做的调查。本文将年龄小于等于26岁,职业为生产线工人、其他普工和技工和班组长作为筛选条件,选出新生代农民工个案1116个,基本情况是:男性占45.6%,女性占54.4%;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水平大多数为初中,占60.1%;未婚者

表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与影响因素变量解释列表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解释
精神健康	价值因子	前途茫然；感到很孤独；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生活很艰难；觉得活着没意思
	生理和心理因子	失眠；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容易哭泣
	精神健康总变量	价值因子+身体和心理因子
迁移压力	迁移感受	文化差异；公平因子；身份包容因子；日常生活条件感受因子；城市适应感觉因子
	工厂体验	交纳押金；交纳的金额；扣押证件；被扣工资；管理人员暴力因子、自由限制因子、环境有害因子；权益保护方面：一周工时；企业福利中保险类因子、工资保持因子；签订合同
	经济和就业压力	工资水平；每月开支；每月金额；找工作容易度
社会支持	工具性支持	亲属、新建关系、政府帮助、市场的支持
	情感性支持	朋友数量；亲属、新建关系、政府帮助、市场的支持

占 88.7%；主要工种为生产线工人、其他普工、技工，分别占 42.6%、28.6% 和 25.7%。

四、结果分析

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基本情况

由表 2 可知，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欠佳，有时会发生和经常发生的比率为 79.5% 和 13.7%。新生代农民工经常面对的精神健康问题上，身心疲惫、前途茫然、觉得生活很艰难、感到很孤独和烦躁易怒分列前五位。具体看，生理和心理因子方面，精神健康症状有时发生和经常发生的比率分别为 71.2% 和 17.3%，主要体现为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和失眠三个方面，三者经常发生比率为 16.2%，11.1% 和 9.1%，这说明 10% 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躯体化现象明显，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价值因子方面，精神健康症状有时发生和经常发生的比率分别为 69.9% 和 11.6%，主要体现为觉得生活很艰难、感觉前途渺茫、感到很孤独和觉得自己很没用四个方面，经常发生比率为 13.7%、12.9%、11.6% 和 8.1%，这说明 10% 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感缺乏。

表2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基本情况

精神健康变量	没有	有时有	经常有	很严重
精神健康总变量	6.5	79.5	13.7	0.3
生理和心理因子	11.3	71.2	17.3	0.2
失眠	42.0	48.1	9.1	0.8
觉得身心疲惫	25.1	57.1	16.2	1.6
烦躁易怒	37.6	50.6	11.1	0.7
容易哭泣或想哭	61.8	31.4	6.5	0.3
价值因子	18.0	69.9	11.6	0.5
前途茫然	42.3	43.0	12.9	1.8
感到很孤独	47.6	39.8	11.6	1.0
觉得自己没用	59.4	31.5	8.1	1.0
觉得生活很艰难	44.1	41.3	13.7	0.9
觉得活着没意思	79.8	16.5	2.8	0.8

2.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本文将迁移压力、社会支持和人口类型变量纳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回归模型中（见表 3）。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的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主要受到其迁移压力的影响，具体是指迁移感受中的日常生活条件感受因子、公平因子、身份包容因子和工厂体验中的被扣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影响。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中的价值因子主要受到迁移感受、工厂体验、就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生理和心理因子主要受迁移感受、工厂体验和政府支持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一定的精神健康问题，其中价值感缺失和躯体化表现最为明显，经常发生的比率均在 10% 左右。影响因素方面，迁移感受和工厂体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不显著。

1. 迁移压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表 3 的三个模型显示，迁移压力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

表3 迁移压力、社会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

指标	变量	模型1：价值模型		模型2：身体和心理模型		模型3：综合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控制变量	常数项	-0.663	0.213	-1.717	0.439	13.730	0.204
	年龄	—	—	—	—	—	—
	性别（男=1）	—	—	0.549	0.178	—	—
	婚姻状况	—	—	—	—	—	—
	教育水平	—	—	0.117	0.042	—	—
迁移压力	生产线工人	—	—	—	—	—	—
	迁移感受	—	—	—	—	—	—
	日常生活条件感受	-0.269 ***	0.076	—	—	-1.274 ***	0.310
	城市适应感觉	—	—	—	—	—	—
	公平因子	-0.274 ***	0.076	-0.319 ***	0.089	-1.663 ***	0.311
	身份包容因子	-0.268 ***	0.069	-0.339 ***	0.080	-1.620 ***	0.283
	工厂体验	—	—	—	—	—	—
就业和经济状况	被扣工资（是=1）	0.446 **	0.187	0.450 **	0.213	2.201 ***	0.471
	找工作容易度	0.129 **	0.039	—	—	—	—
	工资水平	—	—	—	—	—	—
社会支持	政府支持（有=1）	—	—	-0.613 **	0.243	—	—
R ²		0.552		0.553		0.662	

注：** Sig < 0.05, *** Sig < 0.01

（1）迁移感受与精神健康。从模型3可以得出，迁移感受占了方程整体解释力的92%，也就是说迁移感受越积极，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迁移感受中日常生活条件因子、公平因子和身份包容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条件感受越满意、公平感越强、身份包容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由此，假设1.1得到证实。

（2）工厂体验与精神健康。表3显示，工厂体验中仅有被扣工资一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被扣工资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扣工资的精神健康状况差，这主要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有关。虽然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实现自我才外出，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向上的职业流动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性动机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机，所以是否被扣工资对其精神健康有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工厂的管理体制和工厂的福利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主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环境有关。由于珠三角地区的工厂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厂，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的常态化处理，并没有意识到管理体制和低福利的不合理。由此假设1.2得到证实。

（3）经济和就业压力与精神健康。从模型3得出，经济和就业压力对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找工作容易度对价值感因子有显著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感觉越容易，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差。二者之所以成反比的关系，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工作类型有关，杨全河和郭菲（Yang, Q. H. and Guo, F.）认为农民工往往只能进入城市的边缘劳动力市场，大多数工作都是项目型的或者是季节型的。在低收入和低职业地位的工作中，职业的频繁流动是很普遍的^[18]。工人的频繁流动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再次就业的风险。但是这种持续的长期流动的后果往往会增强工人的弱势地位。也就是说，越觉得找工作容易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有可能越频繁，越会缺失归属感和位置感，而频繁的流动使其职业地位越来越低，从而对其精神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由此，假设1.3得到证实。

2. 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模型3显示，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与何雪松、赵延东的研究结论，即社会网络对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的研究结论不一致^[19]。模型2中显示，政府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生理和心理因子之间有显著的影响，获得过政府支持的精神健康状况比没有获得的更差，这可能是因为获得政府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工所经历的事情的严重程度比没有获得过的深所

引起的。假设 2.1 得到否证。

(二) 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迁移压力中仅有迁移体验和是否被扣工资有显著的影响，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之所以表现出与以往的移民研究的巨大差异，本文认为主要是与“流动的劳动力体制”（migrant labor regime）有关。

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是范芝芬（C. Cindy Fan）在分析中国劳动力的制度和性别建构而提出的^[20]，是指国家继承了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制度遗产以强化其能力，强化了基于户口、籍贯、阶级和性别的差异，从而有利于获取农村劳动力的最大价值，这一体制通过户口建构机会，从而进一步的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区隔；国家在流动的劳动力体制的行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一方面形成了低工资、手工工作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吸引了工业和服务业的雇主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渗透进相似的新兴经济体。流动性往往会造成农民工缺乏归属感和位置感，劳动的不确定性也是精神健康很重要的预测因子。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威权制的国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着关键的作用，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是在户口体制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社会 and 资本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就是这一体制下的结果。户籍制度不仅是涉及社会福利、城乡区隔、身份标识，更多的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流动感和不确定感，使得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陌生化”，工厂也因为流动性而不愿意将其纳入社会保险或者提供更好的职业福利，这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国家的户籍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流动的状态，这造成了三种结果：城市社会排斥、社会支持被打破（一方面打破原有支持系统，另一方面城市社会排斥和工厂用工环境阻碍了新关系的建立）、工厂恶劣的用工环境，最终使新生代农民工归属感缺乏，精神健康状况受到极大影响。同时，城市社会排斥、社会支持被打破和恶劣用工环境又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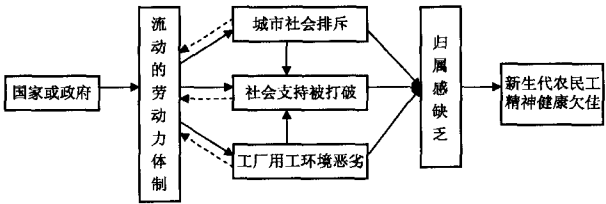


图 1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成因图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欠佳，其中价值感缺乏和精神健康躯体化比较突出，这主要受迁移感受和工厂体验的影响，但是社会支持和人口特质对其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主要与国家、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其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承受社会排斥、恶劣的用工条件、社会支持被打破的三种不利现状，进而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欠佳的社会事实。本文认为要想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推动其市民化进程，从而驱除其流动性，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6.

[2] 潘毅.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 [J]. 社会学研究，1999，（5）.

[3] 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锺. 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J]. 社会学研究，2010，（1）.

[4] 刘东. 结构性制约和精神健康——基于上海外来人口的实证研究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5] Lu Li. Hong-mei Wang. Xue-jun Ye. Min-min Jiang. Qin-yuan Lou. Therese Hesketh.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 Comparison with Permanent Urban and Rural Dwellers [J].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2007，（42）.

[6] Shuva, I. J. T. Migration and Stress [A]. In L. Goldberger & S. Breznitz (eds.), Handbook of Stres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 [M]. London: Free Press, 1982.
- [7] 同 [3].
- [8] 同 [4].
- [9] Wong, F. K. D., Xuesong He. Dynamics of Social Support: A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Study on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 Women's First Year of Resettlement in Hong Kong [J]. Social Work in Mental Health, 2006, (3) .
- [10] Suresh, G., L. A. Furr & A. K. Srikrishnan. An Assessment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Street-Based Sex Workers in Chennai, India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009, (2) .
- [11] 郑广怀. 迈向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理解 [J]. 社会学研究, 2010, (6) .
- [12] 刘传江、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 [J]. 人口研究, 2008, (5) .
- [13] Mikael Nordenmark & Mattias Strandh.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Well-Being among the Unemployed: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J]. Sociology, 1999, (33) .
- [14] 田传胜, 孙菲, 吴咏今. 下岗职工精神健康及其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的调查 [J]. 职业与健康, 2003, (9) .
- [15] Fryer, D. Employment Deprivation and Personal Agency during Unemployment: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Jahoda's Explan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J]. Social Behavior, 1986, (1) .
- [16] House, J., D. Umberson and K. Landis. Structures and Process of Social Support.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8, (14) .
- [17] 威廉·科克汉姆. 医学社会学 [M]. 杨辉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71-72.
- [18] Yang, Q. H., & Guo, F. Occupational Attainments of Rural to Urban Temporary Economic Migrants in China (1985-1990)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6, (3) .
- [19] 赵延东. 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 [J]. 社会, 2008, (5).
- [20] C. Cindy Fan. The State,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Maiden Workers in China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4, (23) .

[责任编辑 董洪敏]

(上接第 69 页)

四、小结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户籍改革应以承认和尊重人的自由为理性基础,还原户籍管理的本来意义,变管理为服务,坚持“人户实际结合”的服务原则,防止户籍制度成为权力部门“搭车”的平台,最终实现户籍制度的单一性、服务性和信息化目标。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城乡界限、地区界限和城市界限,把户籍制度中的人口流动信息登记职能与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经济福利等权利分开,完善身份证电子信息系统,建立可移动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技术层面看,为防止出现政府短期内为所有流动人口提供服务而财力不足的局面,可为流动人口加入城市户籍设置梯度“准入标准”,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 www.cq.gov.cn.
- [2] 彭希哲等.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J]. 复旦大学学报, 2009, (3).
- [3] 国务院提户籍改革新思路: 户口承载福利分步获得 [N]. 中国青年报, 2010-06-04.
- [4] 周永康.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J]. 求是, 2010, (4).

[责任编辑 方志]